

## 李慧琼：民建聯第一批年輕專業議員

阮紀宏

李慧琼為自己、也為民建聯創造好幾個第一：第一位獲排在立法會參選團隊中首位的年輕人，並成功獲選；其參選團隊在九龍西的選區中得票第一。正當民建聯銳意轉型，李慧琼是第一批加入民建聯的年輕專業人士，加入了這個她一度認為有點「老套」的政黨；投入政黨工作以後，才發現裡面原來有那麼多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值得她去學習。

洋名Starry的李慧琼說她從來就沒有想過當明星（star），但從小就參加義工工作，在大學讀書期間，就到地區做義工，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成為了九龍城區議會最年輕的區議員。說「偶然」是因為她從來未想過「一擊即中」，說「偶然」亦是因勝利除了本身努力外，同時「受惠」於對手太懶惰，令區內積累了不少怨氣所致。當時Starry並非民建聯的成員，進入議會後與民建聯的議員一起服務地區，體會到民建聯的成功是建基於「用汗水灌溉社區」、「真誠為香港」的服務精神。

2003年Starry成功連任區議員，眼看多位一直以汗水灌溉社區的民建聯議員因當時的政治氣氛而下馬，心中很替他們不值。想不到的是，當時亦因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成績不理想而辭任民建聯主席的曾鈺成議員，邀請她參加他的團隊，競選立法會。民建聯當時的形勢十分險峻，對手十分囂張，說要「踢走保皇黨」，在九龍西全取四席，所以很多朋友都勸李慧琼，既然已經連任，而且去選立法會又一定選不上，只是陪跑，幹嘛做這種蠢事，千萬不能在這個時候加入民建聯，並指此舉會影響其日後選舉的勝算。

李慧琼當時是這麼想的：第一，所接觸到的民建聯人士，做事實實在在，為街坊、為市民做了很多事，民建聯的慘敗是沒道理的；第二，曾鈺成是她尊重的政治領袖，亦非常佩服他的辯才，在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第三，她參選一直都是為了服務社會，區議會是一個平台，希望能在更高的平台去發揮，而參選立法會可以拓寬她的視野。

### 讓年輕人接班

加入了民建聯後，跟原來認識的民建聯有什麼不一樣嗎？李慧琼說：「我在香港土生土長，跟很多其他的年輕人一樣，認為民建聯有一點『老套』，當然他們為基層、為勞工做了很多事，但作為專業人士，感覺跟民建聯的距離比較遠。加入以後，才發現他們當中原來不乏中產和專業人士。」

到了2008年，曾鈺成要到港島區參選，九龍西要派新人競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擔大旗的竟然是寂寂無聞的李慧琼，而且這個名單只有四位年輕人。而2008年九龍西的選情變化莫測，因新增了一席，吸引了很多新面孔，各政黨亦磨拳擦掌，紛紛加入戰團。李慧琼認為，對她來說，挑戰當然極大，因為她當時的知名度不高，而勝負不僅僅是個人問題，稍有差池，民建聯在九龍西唯一一席都會輪掉。但對民建聯來說，他們滿有把握，因為民建聯的票源從來都相當穩定，有一批忠實的擁護，今次以新人帶隊，希望更多年輕人參選，達到讓年輕人接班的目的。

民建聯想藉起用年輕人以及專業人士改變形象，李慧琼當選是不負眾望，但她能為民建聯帶來新氣象嗎？李慧琼說，在選舉過程中，我們四個年輕人用了不少有別傳統的宣傳手法，例如在行人專用區舉辦音樂會。

民建聯培養新人比其他政黨做得早，做得徹底，但作為被培養的，李慧琼感覺受到信任嗎？李慧琼說，那時其經理人簡志豪，一直以來是曾先生的御用經理人。他帶著李慧琼等人拜訪地區的前輩，向他們推薦，期望他們接納與支持，而普遍支持者及團體對年輕人參政反應正面。反而在當選後，如何在短時間內掌握不同範疇的政策，這才是最大的挑戰。由於李慧琼是新人，很多公共政策都不是十分熟悉，感到吃力，但幸運是前輩都很樂意幫忙她。

### 政治發展空間只會不斷擴大

民建聯正在從基層為主向跨階層轉型，面對不同階層的利益，民建聯怎樣取得平衡？李慧琼作為專業人士加入民建聯，正好是經歷了這個轉型的過程，體會如何？李慧琼說，以最低工資為例，民建聯當初對實施最低工資是有點保留的，但眼見基層人士生活愈來愈困苦，在職貧窮問題日益嚴重，內部經再三討論後，決定支持在個別行業訂制最低工資。其後，由於政府推行的「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民建聯亦進一步支持最低工資立法。不過，除了關注基層，作為跨階層的政黨，民建聯也要兼顧其他階層的觀點，所以到了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民建聯內部亦有諮詢工商界及專業界別意見，了解他們的看法後，才決定我們支持什麼最低工資的水平。

作為專業人士，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前途？當區議員可以兼職，選輸了可以專注自己的專業，但作為直選的立法會議員，全時間投入也不足夠，必須在「專業」及「從政」之間作一個抉擇。對於政治前景，李慧琼說很難估計，但相信香港的政治發展空間只會不斷擴大。現時香港的政治空間有限，民建聯有很多年輕人，每個都很努力，很積極，希望有所發揮。所以李慧琼認為政壇能有更多新面孔，是一件好事，當然也希望香港政界有更多發展空間，讓年輕人一展抱負。

李慧琼承認她正處於專業發展的黃金期，但能夠得到市民支持成為立法會議員，為市民服務，為市民發聲，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是難得的機會。所以，縱使從政代價不菲，亦可能影響專業發展，她仍很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機遇，做好議員的工作。

（摘自《建港心路——與民建聯的緣與份》）

## 發展高端製造業要循序漸進

羅軍 亞洲製造業協會首席執行官

高端製造業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高端製造業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科技含量高，是大量知識密集、技術密集的結合體；二是附加值高，收益高；三是風險高。我國「十二五」工業發展規劃中，重點對高端製造業發展提出了明確的目標任務和發展方向，主要涉及航空產業、航天產業、高速鐵路產業、海洋工程裝備產業、智能裝備製造產業等五大領域。

### 正確處理高端製造業與傳統製造業的關係

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傳統製造業並不是就不發展了。高端製造業只是製造業的高端部分，不可能發達國家的所有產業都是高端製造業，就連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都還一直保留着部分傳統製造業。可以說，高端製造業與傳統產業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傳統製造業在解決大量勞動力就業等方面優勢突出，也是各國政府高度重視的主要原因。但是，傳統製造業往往受制於環境和資源的約束，生存空間正在被逐漸壓縮。如果相比之下能降耗需求少，環境污染小的傳統產業仍然具有強勁的生命力。

高端製造業對傳統製造業的改造是伴隨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而進步的，主要是對傳統產業在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方面給予提升，從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從實踐來看，高端製造技術並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積累起來的，首要的是人才基礎，產業基礎，其次是產業環境。今天，我們在高鐵、深海載人、大飛機、航天等領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有利於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發展高端製造業要切合自身產業基礎，不能盲目發展。

「十二五」期間，在中央配套政策的支持下，我們將在高端製造業領域全面推進，使相關技術變得更加成熟，並逐步延伸到傳統製造業領域。未來十年，將是我國高端製造業基本成熟，並對傳統製造業改

造升級的黃金時期。

### 高端製造業需要核心技術的支撐

製造業的發展一般需要經過幾個不同尋常的發展階段，最初是在嚴重缺乏技術支撐的背景下，手工業迎來了鼎盛時期；緊接着簡單生產技術開始逐步普及，並滲透到生產領域，輕工業逐漸發展壯大；到後來是「三來一補」，帶動了工業化的起步，機械化大生產開始普及；緊接着是重工業的崛起，工業化全面提速，為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打下基礎。

從製造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們可以發現，製造業總是從無到有，從低端到高端，從手工業到機械化大生產，到精密機械的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的核心是技術支撐。因此，我們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高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結合。

沒有核心技術的製造業不能稱之為「高端製造業」。

### 發展高端製造業切忌彎道超車

最近，高鐵領域大事小事不斷發生，給我們警醒。我們的高鐵技術從無到有，從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再創新，走過了很不尋常的路。我們為之高呼，我們應該為我們在高端製造業領域取得的進步而自豪。但是，我們之所以領先於別人，一定是因為我們比別人有更多的創新和大膽探索，當然這也注定了風險同時並存。我們需要加倍注意這些風險的客觀存在，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中國經濟轉型和升級的壓力十分巨大；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我們尤其需要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遵循科學發展規律，切忌盲目性、隨意性，急於求成，千萬不可「彎道超車」！「十二五」期間，為我國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標誌着高端製造業將正式改寫我國傳統製造業的歷史。

## 新聞集團醜聞帶來的民主社會深層課題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在民主社會，保護新聞自由相對比較容易，而要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則在理念、法律和技術上常會遇到重重困難。《世界新聞報》竊聽風波只是一個極端例子，但透過這個極端例子，西方社會的學術理論界應該有一些更深層的探討才對。

媒體王國新聞集團旗下的英國老牌《世界新聞報》因竊聽名人風波而被迫關閉，不但導致新聞集團陷入極大的困境，而且也給人類的新聞傳播事業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

### 民主體制下：媒體與政治關係更複雜

具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長期來依靠披露名人醜聞而獲得市場、建立名聲，其獲取名人資訊的技術手段之一，是極具爭議色彩的竊聽手段。長期來，該報對這一爭議手段屢試不爽，但最後終於栽倒。

這一事件至少提出了媒體界兩個具有爭議色彩的問題：一、在民主政體和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媒體與政治之間到底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二、如果說竊聽手段是新聞自由被濫用，那麼在保護新聞自由和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之間，又究竟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顯然，這裡探討的新聞環境是在新聞自由基本獲得發揚的自由國體或輿論環境。但惟其如此，上述兩個問題才更具有探討的價值，因為一般而言，人們談論較多的是專制政體或輿論環境下新聞自由受到鉗制的情況，而媒體與政治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似乎一般也是就專制政體的情況而言；這種討論的範圍和方式，恰恰忽略了在民主政體和自由環境下，媒體與政治之間一樣會呈現出極其複雜的種種形態。

### 民主體制下的優質和劣質媒體

毫無疑問，在民主政體和自由環境下，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其自由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和保護，政治力量對媒體的限制或鉗制，與專制政體下政治對媒體的鉗制完全不可同日而言。但這不等於說，媒體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相反，媒體追逐真相的本質，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有時會被市場和其他力量所過分濫用，以致形成更為複雜和需要探討並約束的情況。

在專制政體下，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其實相對比較簡單，它基本上是一種鉗制與被鉗制的關係；同時由於專制環境下的媒體大都不具備市場形態，因而政治權力對媒體的控制也就更為有效。當然，轉型期政體和社會下的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有所不同：這種情況下，媒體開始具備市場要素，需要依靠市場來獲得盈利，同時媒體作為第四權力的監督本能也開始獲得釋放；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也就開始複雜而有趣起來。今天中國大陸的情形基本上屬於這一範疇。

但在典型的民主政體和新聞自由環境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媒體本身無論因其追逐真相本身還是受市場效應驅動，有時會呈現出更為錯綜複雜的關係。首先，就媒體與政治的關係而言，由於新聞自由開放，同時政治權力對媒體不具備如專制體制下的直接控制能力，因此媒體與政治之間往往會展開一種十分有趣的「貓捉老鼠」的遊戲。

就媒體而言，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永遠是其追逐的焦點，而且由於「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新聞邏輯，媒體十分傾向於追逐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反常舉動。正因如此，一些不甚嚴

肅的媒體有時會採取極端手段來獲取關於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反常而吸引人眼球的內幕故事，其中就包括如《世界新聞報》此次被揭露的竊聽手段等。

同時，傳媒事業兼有兩個不同的特徵：一方面，作為傳媒業，它有代表公民知情權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它又是企業，必須在市場上贏利才能生存和發展。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時很難得到完美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傳媒業背後經常受到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左右。因此，表面上看，以《世界新聞報》為象徵的媒體醜聞是媒體與政治的博弈，但其實這類事件背後更多的，是媒體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透過傳媒與大眾政治的博弈。

但西方有理想的優秀新聞工作者，面對媒體背後的市場和政治力量，每每會爭取編輯自主的權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南德意志報》編輯部及其工會，就為此與該報董事會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獲得勝利。而一些劣質媒體則在市場力量面前甘於墮落。新聞集團屬下的《世界新聞報》顯然屬於後者。

### 政治焦點和議程受到媒體左右

對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而言，由於媒體追逐力量的過於強大，因此其與媒體之間每每有一種既依賴又利用的奇妙關係。無論在日常政治還是在選戰期間，政治人物對議程和關注焦點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媒體關注度的左右。政治人物發表的每一個言論或推出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考慮到當天晚上電視新聞或第二天報紙頭條的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和政治人物往往已無法按照其本身的邏輯來決定其焦點和議程；政治在受到媒體高度監督的情況下，卻也受到媒體（及其背後的政治和市場力量）的極大左右，並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其本身作為「眾人之事」的本義。

這種情況在平時的日常政治中已十分明顯，在選戰期間尤甚。這是民主政治在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左右之餘，受到媒體力量負面鉗制的一個十分明顯的例證。而由於任何媒體背後都有隱藏的政治和市場力量，因此這一隱藏的政治和市場力量與輿論政治力量的較量，在民主政治形態下，顯現出一種與專制體制下完全不同，甚至更為精彩紛呈的形態。

### 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更為困難

《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揭示的另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如何防止新聞自由被濫用。按照英國思想家洛克的理論，自由權是人類除生命權和財產權之外的第三大權利；新聞自由作為人類自由的形態之一，自然需要得到發言和保護。

與任何自由的形態一樣，新聞自由一不小心也會被濫用。只不過在專制體制下的人們，更多地是為爭取新聞自由而奮鬥，而民主社會的人們，則往往需要兼顧兩個方面，即既要保護新聞自由，又要防止新聞自由被濫用。但民主社會裡，保護新聞自由相對比較容易，而要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則在理念、法律和技術上常會遇到重重困難。《新聞世界報》竊聽風波只是一個極端例子，但透過這個極端例子，西方社會的學術理論界應該有一些更深層的探討才對。

## 公民黨打爛外傭飯碗

美恩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協助3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挑戰《入境條例》不容許家庭外傭在港定居的規定，若她們贏了官司，極有可能出現沒有贏家、全屬輸家的結果，輸家還包括外傭本身。

香港的外傭人數高達29萬，保守估計當中已居港7年以上的逾10萬人，若菲人贏了官司，數以十萬計的外傭便會立刻成為港人，但她們亦有可能立刻成為失業工人。現時的僱傭條例只針對「外傭」，當「外傭」變成港人，便已抵觸了原先的合約條件，在合約條件改變的情況下，那些已變成港人的外傭極大機會失去工作。

就算她們可以獲得豁免，她們的薪酬又如何計算呢？以平日一般包食、包住、包醫療、包機票、包保險來計算，外傭停留在僱主家庭多達24小時，究竟她們有幾多時間在工作、幾多時間在休息呢？根本是難以計算，若每每限時刻，而「外傭」又按章工作，僱傭關係必然出現緊張。僱傭條例改變，僱主可以要求「外傭」支付包

括住宿在內的相關費用嗎？外傭的薪酬一下子調升過萬，香港的家庭有幾多可以承擔得到呢？

可以預計，若司法覆核一旦勝訴，現時不少「外傭」必定會被炒魷魚，而僱主亦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每六年一次轉換工人，僱傭關係每每需要「行人止步」，而僱主的招聘成本亦會必然增加。在欠缺「長工」的保障下，外傭出國成本不變，回報卻減少，亦必然減少來港搵食的意慾。

公民黨成員唆擺東涌綜援居民就港珠澳大橋香港段與建提出司法覆核，令一系列的工程立刻煞停，打破建築工人飯碗；現在又「幫」3個菲律賓家庭挑戰《入境條例》，極大機會令現時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失去飯碗，以致僱傭關係緊張，增加無數家庭煩惱，與無數僱主對着幹。

公民黨處處惹起火頭，與民為敵，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困擾着政府、困擾着市民，不如索性改為「擾民黨」好了。

## 公民黨的「港獨」幽靈

謝緯武 香港國情港事評論社

特區政府順從民意，接受「程序公義」的論點，七月發出了《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為期兩個月，希望市民能在立法會發生議席臨時空缺時，從四個方案中揀選出一個公平合理、合憲合法的替補機制方案，以填補選舉制度上的法律漏洞，杜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浪費公帑的違憲怪異現象重現。

這贏得了廣大市民的認同。諮詢文件公布後，香港研究協會的民調顯示，61%市民認為政府應修例以堵塞辭職再補選的漏洞，55%亦認同當局進行公眾諮詢而非「撤回方案」。越來越多的市民贊成立法確立替補機制，反對抗憲的「公投」，反對浪費公帑，維護國家統一、香港穩定繁榮。

但是，反對派的「大腦」、「師爺」公民黨卻自己撕去了「溫和」、「講理」的面紗，其新老政客、「政客學者」近日又陸續著文，公然發出反替補的抗憲叫囂，對抗憲法和《基本法》，矛頭直指中央和特區政府。《「港獨」的幽靈》在維多利亞上空徘徊，反憲制的山洪已直瀉港九新界。

反替補機制方案，無論從本質上看，

還是從事實上，都是一種抗憲的「港獨」政治訴求。

去年公民黨黨魁余若薇發起「五區請辭」、「五區公投」、「香港起義」，引起市民的憤怒抗議，投票率僅17%，創歷史投票新低。

現時，公民黨的「程序公義」、「剝削權利」、「獨裁霸道」、「傾向性」、「導向性」、「違憲違法」等等一個個藉口、謬論被批駁，仍然要不斷轉移論題、偷換概念、製造輿論焦點，但萬變不離其宗：為「五區公投」翻案，為「辭職公投」製造法理依據，企圖以「總辭」、「民粹」等政治手段，達到要政府撤回替補機制的法案，以便將來不斷發動「辭職公投」，製造抗憲的所謂「憲法慣例」，使「港獨」活動合憲化、合法化。

《基本法》要求我們「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所以香港市民必須團結起來，支持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制訂通過合乎比例代表制要求的替補機制法案，制止「五區公投」的補選事件重演，堅定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國策方針。